

批判、建构和中介

——论反讽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作用

徐 畅

内容提要 反讽是罗伯特·穆齐尔在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采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手法。对穆齐尔来说，反讽在这部小说中具有三种主要功能：一是质疑和批判现实；二是建构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真实世界；三是防止小说过于哲学化。

关键词 反讽 建构性反讽 哲学和文学的中介

反讽是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手法。反讽在小说中贯穿始终，大到情节的安排，小到语句的使用，几乎处处都有反讽。反讽在这部小说中不单是修辞手法和语言风格，而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原则，具有多个层面的意义，它对小说思想内容的传达和整体风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夸张地说，不充分理解反讽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就无法充分理解这部小说。

作为一种写作手法，反讽很容易被单纯地归结为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形式因素，黑格尔就认为反讽是“艺术中的形式游戏”，^①但是自浪漫派以来，反讽的意义已经大大扩展，尤其到了现代主义阶段，反讽更是成了一个具有形式和内涵两方面意义的概念。D·C米克在其专门论述反讽的书中就

认为反讽“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既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②反讽的这种兼具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的意义的特点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体现得极为充分。在这部小说中，反讽在内容上的意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质疑和批判现实，另一个是建构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真实世界，而其形式层面的意义则是作为一种中介手段来调和小说的哲学倾向和文学诉求之间的矛盾。

一、质疑现实——反讽的批判功能

反讽的基本形态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即是说，反讽说的是A，意指的却是B，这个B可能是A的对立面，也可能不是，但无论如何它不是A。反讽的这种基本

形态决定了它首先是一种用隐含事实对陈述事实进行质疑和否定的态度。克尔凯郭尔在博士论文《论反讽概念——不断回顾苏格拉底》中认为反讽是一种“绝对否定的自由”，它“否定全部历史现实，为的是给一种由它自己创造的现实让出地方”，^③对于反讽者来说，现实“失去了有效性”。^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讽是对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反讽地加以描述的现实总是有缺陷、不完美的现实，反讽的效果就体现在这个不完美的现实与理想中的完美现实之间的差异上。

《没有个性的人》中存在着大量这种旨在质疑和批判现实的反讽，它们主要用于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描写，对卡卡尼帝国的描写就是一例。卡卡尼一词由“皇帝”和“国王”两个词的开头字母构成，是作者对当时的奥匈帝国的称呼。这个称呼本身就充满了反讽意味，它用貌似简洁清楚的词汇指称了一种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国家政体形态。在这个名字很奇怪的国家联合体中，人们的政治生活似乎也永远都是名实分离的：

按其宪法它是自由主义的，但它受教会的统治。它受教会的统治，但人们却过着思想自由的生活。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正好是公民。人们有一个议会，这议会如此粗暴地滥用其自由，以致人们通常都将其关闭；但人们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凭借着它的帮助，人们没有议会也能行，而每一回，一旦大家已经对专制政体感到愉快了，王室便会下令重新实行议会统治。^⑤

读者如果感受到了这种状况的荒诞和可笑，也就感受到了作者对这一现实不动声色的质疑和批判。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现实描写，几乎

所有对现实的描写都被加以反讽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反讽所体现的对现实的质疑是由贯穿这部小说的“可能性意识”决定的。“可能性意识”是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种质疑现实、重视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思维方式。^⑥对穆齐尔及其主人公乌尔里希来说，现实不再是铁打不动的绝对，而是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已经“失去了有效性”，这样的现实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背后蕴藏的可能性。因此，对穆齐尔来说，“只有在与可能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现实才值得加以表现。”^⑦沃尔夫迪特里希·拉施认为，这是穆齐尔在小说中采用反讽这一风格的根本原因，因为反讽能“使现实光滑的表面出现一道道裂纹，使它坚硬的外壳开始融化”。^⑧

在小说中，这种质疑和批判现实性质的反讽主要用在对“平行行动”的描写上。“平行行动”是小说第一卷第二部的主题故事，也是整个小说的背景。事情的起因是1918年德国举办大型活动庆祝威廉二世登基30周年，卡卡尼帝国为了同德国一争风采，也大张旗鼓地为约瑟夫皇帝在位7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在平行行动的策划者和筹办者、奥地利上层社会政要和知识分子看来，平行行动应该被办成一个能够昭显奥地利民族精神、提高奥地利的国际地位的爱国活动，因此他们挖空心思要找出一个伟大的主导思想来与这场伟大的行动相匹配。如果说整部《没有个性的人》可以被视为穆齐尔对当时奥地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所做的一次全面细致的反思和诊断，那么对平行行动的描写则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批判意味的部分。

小说对平行行动的反讽是多角度、全方位、复杂而深刻的。首先，作者把乌尔里希安排成“平行行动”筹委会的秘书。乌尔

里希就是小说题目所说的那个“没有个性的人”。他当时刚从国外回到奥地利，由于“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决定“给自己放一年的生活假”。所谓的生活假（Urlaub vom Leben），即对生活采取一种旁观的、反思的、不参与的态度。无论是“没有个性”还是“给自己放一年的生活假”，都表明乌尔里希对现状采取了一种质疑和否定的态度。在他个人的精神困惑没有解决之前，他不可能真正投入到任何事情中去，更何况这场平行行动本身就很可疑，因此他只能是处在一种表面参与、内心游离的状态中。让这样一个人充当平行行动筹委会的秘书，这不啻是对这个在主办者的设想中应该能够征服人心的所谓爱国行动的极大反讽。

其次是通过蒂奥提玛这个人物对平行行动进行反讽。蒂奥提玛是外交部司长图齐先生的夫人，也是筹委会定期聚会的沙龙女主人。这是一个知识渊博、谈吐优雅、自认为具有深刻思想的女人，用穆齐尔的话来形容是一个“精神女巨人”。乌尔里希与“平行行动”筹委会的首次正面接触就是他去拜见蒂奥提玛，他发现蒂奥提玛对于平行行动抱有巨大的热情——因为她能够借这个行动凸显自己的才华和社交风度，但是她又说不出这一行动的具体意义何在——因为这个行动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她年轻、漂亮，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调情的可能性。从一开始，与其说乌尔里希对平行行动感兴趣，还不如说他对这个漂亮的女人感兴趣。正如穆齐尔给这一章所拟的标题所说，“平行行动以一位有影响的、具有难以形容的优美才智的女士的形态准备吞下乌尔里希”，这无疑是对平行行动这一严肃的、抱负非凡的爱国行动的又一反讽。

再次是通过阿恩海姆的参与进行反讽。阿恩海姆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就是平行行动的竞争对手中的一员，但他却莫名其妙地进

入了平行行动筹委会的核心圈子。所谓的爱国行动的荒诞可笑由此也可见一斑。

此外，平行行动的反讽还在于，为了这项抱负非凡的爱国行动，奥地利的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们定期举行聚会，雄心勃勃地要为这场伟大的爱国行动找出一个主导思想，但却始终拿不出任何令人满意的方案。其原因当然在于这种所谓的爱国行动根本不具备实质的意义。如乌尔里希所说，它遵循的是“不充分理由原则”，^⑨也就是说，这是一件没有适当的理由就发生的事，是人为的“偶然”，是一次有规模有组织的盲目行为，其实质是官僚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一场狂欢，因而必然只能沦为无休止的理论空谈而创造不出任何具体的内容。最后，这一情节的更大的反讽意义还体现在，平行行动的发起人莱恩斯多夫伯爵最初在提出平行行动的想法时，认为“必须发生点什么”以提高奥地利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然而在小说最后，这一所谓的“和平的”爱国行动却是以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结束的，这不啻是对莱恩斯多夫伯爵那种以为人的意志能够自由地“发明和创造历史”的想法的极大反讽。

除了情节上的反讽之外，这种批判性的反讽还大量地用在对小说人物的描写上。比如对蒂奥提玛和对阿恩海姆的描写。对这两个人物的反讽在小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因为这两个人物正是穆齐尔所要针砭和批判的时代文化观的典型代表。在穆齐尔所处的时代，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不断加强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人们普遍感到生存的异化，非理性思潮盛极一时。而深受该思潮影响的很多人却并未对理性和心灵的关系做过透彻的反思，而只是一味叹息理性和技术对人的心灵的统治，因此这些人实质上只是在附和流行的文化观点，凸显自己的文化姿态。蒂奥提玛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对此，穆齐尔认为，人们不是有太多理性、太

少心灵，而是在心灵的问题上太少理性。穆齐尔的目标是把理性和心灵统一起来，这也是他试图在这部小说里探讨和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由于理性和心灵之间固有的对立，要统一两者并不容易，主人公乌尔里希在整部小说中苦苦求索，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在阿恩海姆身上却似乎得到了完满的解决。阿恩海姆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通才”，他是个大富豪，他“能操控煤炭的价格，并且是德国皇帝的私人朋友”，与此同时，他还“写诗”，欣赏艺术，谈论科学和神秘主义，他懂哲学、经济、音乐和体育等诸般学问。用小说第47章的标题来说就是：“把我们大家分开的东西，全集于阿恩海姆一身了。”^⑩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困惑似乎在阿恩海姆身上就这么容易地得到了解决。但是，穆齐尔以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反讽态度描写了阿恩海姆的“整体的秘密”，揭示出这样一个通才实际上对每个领域的知识都只是一知半解，他既不具备真正严谨的理性，也从未真正触及心灵，他成功和出名的秘密其实在于他有良好的经济背景和文化上的自我炒作意识。作为一个喜欢标榜自己的文化品味的商人、政客和一个成功的公众人物，阿恩海姆的情况非常具有迷惑性，而反讽的写法能够不动声色地揭示出，这样的情况只是穆齐尔在小说中思考的理性和心灵的统一问题的一个伪答案。

二、建构性反讽——现代意义上的反讽

尽管《没有个性的人》中存在大量批判性的反讽，但对穆齐尔来说，质疑和批判现实并不是他采用反讽手法所要达到的首要目的。对他来说，反讽最根本的功能在于表现世界的矛盾本质，这一点可以从他提出的“建构性反讽”这个概念中看出来：

把一个牧师描写得好像他身边还站着 一个布尔什维克分子；描写一个流氓，但作者突然觉得：我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一个流氓。这一类反讽，即建构性的反讽，在当今的德国鲜为人知。这种反讽指的是事物的内在关联，事物正是从这种内在关联中赤裸裸地呈现出来。¹¹

“建构性反讽”是穆齐尔特别提出的一个概念，因此特别能体现他的反讽观。在他看来，反讽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嘲讽和讽刺，而是在于如实地表现“事物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就是一个牧师身上可能同时也含有布尔什维克的成分，一个审视流氓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可能也是个流氓。用穆齐尔的另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任何事物中都藏有一点正确的东西”，¹²反之，任何事物也都藏有一点不正确的东西。事物就是这样复杂而矛盾地存在着，单纯强调和表现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和不准确的。作为一种表现方法，反讽能够既说出事物中 A 的方面，同时又暗示和意指事物的 B 的方面，因而能够完整地表现事物的矛盾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性反讽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即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在这一观点上，穆齐尔同德国浪漫派是一脉相承的。浪漫派理论家施莱格就曾说过，反讽是“对于世界在本质上即为矛盾、惟有模棱两可的态度方可把握其矛盾整体的事实的认可。”¹³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反讽在浪漫派的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穆齐尔不同的是，浪漫派对反讽的重视和强调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施莱格从未在创作中真正有效地使用反讽手法，而穆齐尔却以反讽为手段，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世界。

建构性反讽在小说中比批判性反讽使用得更多更广泛。比如对克拉丽瑟和瓦尔特的描写就使用了建构性反讽。这两个人都是主人公乌尔里希的朋友。克拉丽瑟狂热崇拜尼采哲学，整日幻想将这种哲学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幻想拯救世界，她的言论和行为有些时候疯狂得让人觉得好笑，但读者又不能不承认，她的思想有时候是犀利的、准确的。瓦尔特和乌尔里希一样对时代和文化持批判态度，并且也认为自己负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但他懦弱和敏感的性格最后使他对世界采取一种逃遁的姿态。穆齐尔对他们的描写是不无反讽的，但这反讽中又含有一部分认可与同情，他们两人所代表的思想都可以被理解为乌尔里希思想历程的早期发展阶段。正是基于“任何事物中都藏有一点正确的东西”这一认识，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的思想和性格是穆齐尔彻底认同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他彻底否定的。沃尔夫迪特里希·拉施甚至认为，小说中塑造的几乎每个重要人物身上都有主人公乌尔里希的一部分理想，他们只不过是局部地、片面地、变形地、极端地或者错误地体现着这部分理想，有时候他们代表着乌尔里希已经超越了的早期阶段的理想，有时候他们是乌尔里希的映衬或者反射，甚至连“滑稽可笑的施笃姆·冯·博德威尔将军和他那种一切都与军事有关的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里……也藏着乌尔里希的影子”。¹⁴可以说，建构性反讽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人物或事物身上的各个侧面，用彼此矛盾和看似不和谐的因素构造出一个个复杂而真实的整体。

与穆齐尔同时代的另一位擅长反讽手法的德语作家托马斯·曼认为，反讽就是客观性，反讽“肯定一切，正因为如此，也否定一切；它是一种昭若明日、明晰、轻快、包罗一切的目光，称得上艺术的目光，毋宁说是最高的自由、静穆和一种不为任何道学

所迷惑的客观的目光”。¹⁵这与穆齐尔的反讽观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两者同样都将反讽视为对事物的一种客观认识，但如果考察两人反讽观中所体现的反讽主体在反讽行为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感受的情感，就会发现两种反讽观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托马斯·曼的反讽观中含有一种超脱感，因为他认为反讽能够“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并“包罗一切”，换句话说它能够凌驾于一切之上。这种超脱感来自于一种智力上和情感上的优势，因为反讽“不为任何道学所迷惑”，它是“最高的自由”。这种智力上的居高临下感通常被认为是反讽者特有的姿态。D. C. 米克将这一特点总结为反讽的“超然因素”，认为它“似是隐含在佯装的概念里，因为反讽者的佯装能力表明他能控制比较直接的反应”。¹⁶这一点在苏格拉底的著名的辩论式反讽中有典型的体现。在辩论中，苏格拉底通过佯装无知而将对方引向荒谬结论，正是因为他占据着智力上的优势并能控制整个局面。但与此不同的是，穆齐尔在1926年接受冯塔纳的访谈时明确否认自己采用反讽的写法是含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在日记中写道：

苏格拉底是佯装不知道。现代人是不知道！¹⁷

在穆齐尔对现代人的反讽所做的这句论述中，人们的确看不出他有任何智力和情感上的优越感，相反，其中却似乎含有一种迷茫和困惑。“佯装不知道”的苏格拉底拥有对于自己和对于辩论对手的双重控制能力，因而具有一种居高临下感和超脱感；而真的“不知道”的现代人则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所处的局面都感到迷惘。苏格拉底的反讽是由苏格拉底人为制造的，而穆齐尔所谓的现代人的反讽则源于现代世界本身的矛盾

性，因此身为反讽主体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是身在局中，不能超脱。这样一来，穆齐尔的反讽观中就含有某种涉及生存状态和情感感受的东西，它表达了个体的人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种种矛盾和悖论所体会到的身份的迷失和情感理智的混乱。

小说中叙述的莫斯布鲁格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反讽意味、引人深思的事例。莫斯布鲁格是一个强奸杀人犯，他以非常残忍的方式杀害了一个纠缠他的妓女，但法庭却迟迟无法给他定罪，原因在于法庭无法断定莫斯布鲁格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莫斯布鲁格的智力显然不完全正常，但同时又无法确诊为精神病，他是那种“介于两可之间的、难以确定的例子之一”：¹⁸

这些不幸的人的特点是，他们不但不是足够地健全，而且也不是足够地有病。大自然有一种奇特的偏爱，喜欢制造出大批这样的人来；大自然不作跳跃，它喜欢过渡状态，从整体上说，它把整个世界也保持在这样一种介于弱智和健全之间的过渡状态中。¹⁹

面对这种被大自然“大批”制造出来的现象，或者说面对世界整体的这种“过渡状态”，精神病学家和法学家都无能为力。精神病学家只能判断莫斯布鲁格有病，但他的病是否严重到使他丧失法人资格，他们却无法给出结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半疯的人。然而对于法学家来说，根本不存在半疯的人。法学家认为：

人要么有违法律而行事的能力，要么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在这两个对立面之间没有任何第三种状态或中间状态。²⁰

如果说莫斯布鲁格的智力健康状态隐喻着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状态，那么法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则隐喻着抽象的社会法律政治体系和科学语言对人的生活所进行的规定和划分。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体系和规则的社会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就这样存在着。这些冲突和矛盾令人啼笑皆非，而且往往以牺牲个体的情感和价值而获得表面和暂时的解决，因此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感受到某种痛苦。穆齐尔准确地把握到了现代人的反讽中所包含的这种严肃的甚至痛苦的情感内涵：“反讽必须含有某种痛苦的成分（否则它就是一种自以为是了）……”²¹ 看一下小说中描写狱警给莫斯布鲁格转狱时的情景，读者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情感上的微妙刺痛：

看到移监时狱警那样谨慎从事，他感到受宠若惊。荷枪实弹、许多人、手铐脚镣——人们重视他，人们惧怕他，莫斯布鲁格喜欢这样。当他登上囚车时，他期盼着受到赞叹，于是他看了一眼过路人那惊讶的目光。顺着街道刮过来的冷风吹拂着他的发髻，他有点弱不禁风。两秒钟之久。随后一个法警在他的屁股上推了一把，把他推上了车。²²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对莫斯布鲁格那份不同于常人的虚荣心感到好笑，因为这种虚荣已经发展到要从别人对他的防范和惧怕上寻找一丝安慰的地步。但是在相隔一个段落之后，作者写道，莫斯布鲁格“不怕死”，因为生活没什么好让他留恋的。“要是说有什么事会让他感到高兴的话，那恐怕就是满足他那一向总是遭到愚蠢侮辱的虚荣心了。”²³ 原来，这个以残忍的方式强奸杀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他的生活从头到尾只是充满了别人对他的侮辱，尽管智力有些低下，但他的内心却对这些侮辱非常

敏感，以至于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一点哪怕是畸形的尊严。正如作者在庭审一章中所写的那样：

他的整个一生就是一场令人发笑和惊愕的笨拙的战斗，目的就是为了强求自己的生命的价值。²⁴

如果说每个人都有实现自己生命价值与维护尊严的权利的话，那么莫斯布鲁格是属于怀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但却被剥夺了实现这种价值的能力的人。这是一种含有痛苦情感的反讽，莫斯布鲁格的种种行为和心态虽然可笑，但读者在笑过之后却感到沉重。若想理解这样的反讽，读者必须如汤普森所说，“为出了偏差的人物或理想而感到痛苦。笑声发了出来，但又凝固在唇吻上了。我们所关心的某人某事被残忍地戏弄着，我们观看可笑的事，却被刺伤了感情。”²⁵可以说，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反讽，它最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人那种充满矛盾、悖论的生存处境和随之产生的复杂情感体验。

三、心领神会——反讽作为哲学和文学的中介

穆齐尔对自己的写作手法具有清醒意识，他本人曾多次思考反讽对他的小说的作用。在一篇日记中，他写道：“《没有个性的人》的前200页，我写了约10个不同的手稿，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极富意义的自我认识，那就是：最适合我的写作手法是反讽。”²⁶

穆齐尔之所以把反讽视为最适合他的写作手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独特的文学诉求有关。在穆齐尔看来，文学和哲学不是截然分开的，小说也应该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他

要求小说成为一种能思考、有智慧的艺术形式，因此他曾经说过：“对我来说，风格就是将思想精确地呈现出来。”²⁷但与此同时，他始终强调自己是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他认为文学比人类其他一切活动形式都更重要，文学“不但以认识为前提，而且还是对认识的进一步延伸”，²⁸文学触及的是一个“由感知、多义和个体性构成的边界领域”，²⁹这个领域是无法单凭理智进入的。也就是说，穆齐尔的抱负在于将文学和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这就决定了反讽必然成为他最青睐的写作手法，因为反讽恰恰是一种介于文学和哲学之间的言说手段。

毫无疑问，反讽是一种文学手法。穆齐尔曾经区分哲学和文学的不同。在他看来，哲学意图表达真理，是概念和绝对，因而是单义的和明确的；而文学是譬喻，是多义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讽式的表达更接近文学表达，因为反讽在内容上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隐蔽的冲突，彼此否定和削弱着对方，因此反讽不含有对任何绝对价值的主张。此外，在作用机制上，反讽式表述隐含的不同层面的价值观不是以解释或论证的方式直白地呈现给读者，而是通过言此而意彼的方式非常微妙、迂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读者“心领神会”，也是更接近文学的理解方式。

但与此同时，反讽又是一种间接的理性原则，因为它要求反讽主体与反讽对象之间存在一个反思的距离，并借助这个反思距离对对象的表面事实和隐含事实同时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反讽实际上又是一种反思和认识能力。正如本文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它是对事物的矛盾整体所做的认识和把握。因此，E. 施莱格尔甚至称：“哲学是反讽的真正故乡。人们可以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³⁰

反讽既具有文学的特点又能满足理性认

识的要求, 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是文学和哲学之间的最好的中介物。在德语文学史上, 第一个赋予反讽以哲学和文学之间的中介物功能的文学流派是浪漫派, 这与浪漫派的艺术主张是密不可分的。与穆齐尔一样, 浪漫派也非常重视诗与哲学的综合。按照浪漫派的观点, 反讽是“诗的反思”, 它是诗向哲学方向的突破或哲学向诗的方向突破。施莱格尔说: “反讽包含和激励着一种感觉, 一种无限与有限之间、完整传达的不可能性和必要性之间无休止的对立冲突。”³¹ 反讽能够同时说出互为矛盾的文字意义和文字以外的意义, 因此是一种突破语言的既定状态、寻求诗和哲学之外的其它可能性的表达方式。

浪漫派试图通过反讽的文学来对诗和哲学进行综合, 黑格尔认为是不可取的。在黑格尔看来, 作为诗与哲学的综合体, 反讽的文学在概念的普遍性和形象的确定性之间摇摆不定, “既不是鱼又不是肉, 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³² 他认为这种摇摆不定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但是对穆齐尔来说, 这种“摇摆不定”却恰恰是他所需要的, 他在反讽的文学中见到的不是既非鱼又非肉的缺憾, 而是鱼肉兼得的可能。他要借助这种反讽的姿态一方面将僵化的价值观和传统叙事方式置于不确定之中, 一方面又避免给出任何新的绝对价值。

1926年接受冯塔纳的访谈时, 穆齐尔指出《没有个性的人》采取了两种避免它过于哲学化的手段, 其中之一就是“一种反讽式的基本态度”。³³ 所谓基本态度, 是针对小说整体而采取的态度。如果说反讽的态度必定含有对自身有效性的质疑和动摇, 那么一部将反讽贯彻始终的小说就不会给出任何确定无疑的和绝对的价值观。这一点在小说一开始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小说开篇第一章的标题是: “Woraus bemerkenswerter Weise nichts hervorgeht”, 中文可以翻译为:

“奇怪地什么都没产生”。在语法上, 该标题的德语原文是一个名词性从句, 作为标题, 它指的是这一章所写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 这一章所写的全部内容“什么都没有产生”。如果用符合中文思维的句子来表达, 这个标题可以大致解释为: “本章所写的内容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考虑到标题的引言作用, 我们会发现, 这句话还可以引申出一个隐含的意思: “下面就请您开始读这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内容吧。”可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反讽效果的标题, 它使读者在翻开小说第一页的时候就感觉到一丝不确定。

类似的具有较为明显的反讽效果的章节在小说中还有一些, 比如第28章《任何一个对研究思想没有特殊爱好的人都可以略过的一章》。另外, 还有很多章节标题的反讽意味并不明显, 但是一旦读完章节的内容, 标题的反讽意味就昭然若揭了, 比如第27章《一个伟大思想的本质和内容》第40章《重要会议》和第111章《对于法学家来说没有半疯的人》等等。通过反讽, 小说把它讲述的一些东西置于摇摆和不确定之中。

作为一种贯穿全书的基本态度, 反讽同时也是针对主人公乌尔里希而来的。乌尔里希身上有作者穆齐尔本人的影子, 两人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都非常相似: 小说中的乌尔里希曾经当过军官, 而穆齐尔本人曾就读军事学校; 乌尔里希曾经致力于成为一名工程师, 后来成了一个数学家, 而穆齐尔本人在大学曾先后学习过机械制造和数学。在某种程度上, 作者穆齐尔对主人公乌尔里希是存在着心理认同的, 乌尔里希的言论和思想有时候直接反映着穆齐尔的思想。但穆齐尔并不想借助乌尔里希这个人物把整部小说变成他的思想的演讲台。早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还叫“安德斯”的阶段,³⁴ 穆齐尔就曾经

在一篇笔记中写道：

我应该把安德斯本人也写成一个反讽者吗？要么通过安德斯对我的哲学进行反讽，要么借安德斯之口说出这些哲学。很可能两样都做！³⁵

事实上，穆齐尔的确两样都做了。乌尔里希（安德斯）被塑造成了一个反讽者；他在小说中替穆齐尔阐述了很多哲学见解，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些哲学不断进行反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小说中虽然存在种种哲学，但所有这些哲学却都被置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的基本语境中。这样一来，小说虽然具有浓郁的哲学味道，但在总体上却绝非一部哲学小说，因为小说并不是在解释和宣讲某种哲学，而是在持续不断地思考，这种思考是滑动的、多义的和相对的，很多时候它恰恰是通过取消既有的思考成果这一形式而进行的。这可以视作穆齐尔借助“反讽式的基本态度”防止小说过于哲学化。

综上所述，反讽在《没有个性的人》这部小说中的作用是多层次的。在内容上，反讽一方面起到质疑和批判现实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具有在小说中建构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世界的功能；在形式上，反讽是调和小说本身的文学诉求和它的哲学倾向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反讽与这部小说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对小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15f

- ②¹³ 16 D. C. 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7、28、53页。
- ③④³² 转引自 Uwe Japp *Theorie der Ironie*. Frankfurt am Main: Kbstemann, 1983, S. 16, S. 17, S. 196
- ⑤⑨⑩¹¹ 18 19 20 22 23 24 35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张荣昌译，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32-33、151、216、193q、27q、27q、28q、244、245、7q、1775页。
- ⑥ 关于“可能性意识”可参见本人论文《可能的文学——罗伯特·穆齐尔的随笔主义》，《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第15页。
- ⑦⑧¹⁴ Wolf Dietrich Rasch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Eine Interpretation des Romans*. In: Wolf Dietrich Rasch, Über Robert Musils Roman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1967, S. 77, S. 77, S. 87
- 12 21 33 Robert Musil *Tagbücher, Aphorismen, Essays und Reden*. Hrsg.: Adolf Fris, Hamburg, 1955, S. 415, S. 500, S. 786
- 15 托马斯·曼《论小说艺术》，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第304页。
- 17 26 27 28 29 Robert Musil *Tagbücher*, Hrsg.: Adolf Fris, Reinbek bei Hamburg, 1976, S. 736, S. 928, S. 492, S. 1327, S. 1327.
- 25 A. R. 汤普森《不动声色的嘲讽——戏剧中的反讽研究》转引自 D. C. 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 30 31 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23、39-40页。
- 34 “安德斯”是穆齐尔最初给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起的名字，后来改为现在的“乌尔里希”。安德斯 (Anders) 意为“另外的、不同的”。

[作者简介] 徐畅，197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助理研究员。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可能的文学——罗伯特·穆齐尔的随笔主义》等。

责任编辑：萧 莎

①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I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Bd. 20 ed. E. Moenchauer u. K. M. Michel Frankfurt 1971 S.